

“鲁荣渔2682”的血色航线



记者-许智博 山东威海报道

三年前，26岁的刘贵夺在大连劳动中介的牵线下，乘船来到石岛港。

彼时，这个年纪不大的黑龙江青年，如同许多80后农民工一样，在初中辍学后先是在家务农，此后外出打工，干过销售员、建筑工人。石岛是北方最大的国家中心级渔港，位于黄海边，距离威海一小时的车程，与大连隔海相望。刘贵夺想在这座渔港立足，唯一的经验，就是在2000年左右，他当过船员，有过短短的两天出海经历。

在石岛，刘贵夺与当地的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下称鑫发水产）签了合同，成为了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上的33名船员之一。“鲁荣渔2682”是石岛第一艘大洋鱿钓船，2000年5月起出海作业。和石岛大多数远洋捕捞渔船一样，它的作业水域是西南太平洋阿根廷外海和东南太平洋。

2010年12月28日，“鲁荣渔2682”号的船员们，按照习俗放了一挂鞭炮，祈求渔船满载而归。仪式结束后，渔船在残留着火药味道的港口起锚，驶往秘鲁、智利海域进行“鱿钓”作业。这是一次计划为期两年的航程。在浩瀚的大海上，接近与世隔绝。

但半年多后，这艘渔船却上了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它先是莫名地从既定的捕捞海域消失，一个多月后，又诡异地现身日本海域，动力全无，船员人数锐减。种种迹象都显示着，这艘远洋渔船上发生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

2011年8月12日，“鲁荣渔2682”被中国渔政118号船拖回了大雨瓢泼的石岛港，很多目击者仍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警戒线内，11辆警车早早等在码头，分别押走了船上下来的11个船员，这是当地从未见过的事情。

后来警方的消息则更让人惊诧：消失的22名船员中，20人被杀，2人失踪；回来的11个船员中，竟然全部参与了谋杀，首犯正是刘贵夺。

2013年7月19日，这个特大刑事案件在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和李承权一审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告的量刑从死缓到有期徒刑4年不等。

淘金梦

出海时，“鲁荣渔2682”的33名船员在构成上泾渭分明：船长李承权、大副付义忠和二副王永波三个大连人是多年的好友，他们通过熟人关系，召集来更多大连籍的职业船员组成了“鲁荣渔2682”的管理层，其中，船员吴国志、姜树涛、段志芳和崔勇都是二副王永波的亲戚，来自金州的温斗、温密兄弟分别担任渔船的轮机长和二管轮，夏琦勇是伙食长。

黑龙江人刘贵夺和其老乡姜晓龙、刘成建等人，也通过大连的中介公司介绍上船；随后被中介牵线上船的还有四个内蒙古人，以包德格吉日胡（下称包德）为首。这批务工者中，90后的黄金波虽然来自内蒙古，但却与刘贵夺走得更近。

他们有着诸多共性，大多小学、初中文化，家庭经济条件十分拮据，几乎都怀揣着海洋淘金梦：温斗为刚刚出生的孩子奶粉钱再次选择了出海；退伍回家几年的崔勇刚交了女朋友，想赚更多的钱；丁玉民离异后来石岛投奔妹妹，后决定到船上赚笔做小买卖的本钱，伙食长夏琦勇也有着类似的想法；邱荣华在老家搞过几次养殖，都以赔本告终；吴国志不顾腿疾，只想为儿子攒出买房的钱。

老家在黑龙江的大学生马玉超则是33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个。毕业后工作一直不如意的马玉超希望“出去闯一闯”，让一贫如洗的父母不再仰人鼻息，结束在大连的亲戚家寄人篱下的生活。

船员们在出海前都与鑫发水产签订了聘用合同，合同规定：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保底收入为每年人民币45000元，合同期限为2年。与此同时，合同附件列有工资标准，包括月工资、年工资和提成标准。管理层的合同比普通船员多了一页，上面罗列着对应的岗位职务工资。

这些没有出海经验的新船员在起航之前，都颇下了一番决心。马玉超上船前给母亲冯桂杰打电话说：“今天要走了，一会儿就没有信号了，妈你别想我，两年就回来了，就当我出去上学了。”在安抚了母亲之后，他又给同学发了一条短信：若有缘，两年后再见。

文化程度不高的冯桂杰当时对远洋“鱿钓”一无所知。她曾心疼地提出要从大连去石岛港送行，马玉超体贴地拒绝了母亲的好意，他说，“妈，我太了解你了，告诉你我公司的地址的话，你就会跑过来拽我回去。”

丁玉民也曾安慰妹妹说，你就当我蹲了两年的监狱。

在一番离别之情中，“鲁荣渔2682”载着33人开始了淘金之旅，其中职业船员有10人，还有18个没有任何海上生活经验的打工者。

从起锚到航行至作业海域的这段时间里，对远洋尚有的新鲜感和无事可做，让船员们相安无事，等级和地域的差别并没有让大家产生什么隔阂，很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还能聊到一起，少数人克服了晕船，马玉超还坚持写着日记。春节时，船员们第一次用卫星电话依次向家里报了平安，说过节改善了伙食。

将近3个月的航行后，“鲁荣渔2682”到达了作业海域，船上的生活因为“鱿钓”作业开始上紧了发条，撒钩，拉线，然后将钓上来的鱿鱼装箱冷冻。海天一色中，船员们的日子机械重复，枯燥无味。

根据船员冯兴艳的供述称，在“鱿钓”开始之前，船长李承权向他们宣布，两年内，从事“鱿钓”的船员每人要钓

满80吨鱿鱼，才能拿到合同上的工资。后来李承权在法庭上的解释是：如果完不成钓鱼量，公司会给保底工资，每月1000元；如果钓到鱼，就按照月工资加提成计算。但刚开始干活的时候，很多没有经验的船员并没有去仔细计算自己的工作量，注意力还在掌握“鱿钓”技巧上。

2011年“五一”时，船员们向家里打了第二次电话，丁玉民对妹妹说，原本担心自己干不了钓鱿鱼，但开工之后，发现并没有多难。冯桂杰在电话里，对儿子的态度也从担心转为了鼓励。

众多从事“鱿钓”的船员中，刘贵夺是工作最努力的一个，根据公司提供的生产产量记录，刘贵夺在当年3、4、5月的产量分别为8284斤、5946斤和13586斤，排在所有船员的榜首。

如果只看纸面上的产量，似乎每个船员完成指定的任务没有问题—但在南半球低温多雨的冬天里，船员要维持这样的产量，劳动强度超乎想象。后来手上沾了20条人命的刘贵夺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还有连续工作两宿一白天，不睡觉，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

船员们开始计算自己能否完成生产指标，刘贵夺最后算下来，拿到手的收入还不够还登船前在岸上赊下的烟钱。后来同样成为谋杀主犯之一的姜晓龙称，“钓了2个月左右，船员开始讨论说，工作太累，工资没有保障”。

2011年6月，船员黄金波和岳鹏因病不能继续工作，李承权随即通知公司，停发了二人的工资。猜疑和不信任，慢慢将新船员和管理层推向对立，有船员称船长的粗暴管理激发了矛盾，“船上不许说话，不许抽烟，甚至殴打船员”。

高压气氛在这艘不到40米的渔船上悄悄蔓延。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带着不满情绪的新船员们开始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开始了一场让人震惊的串谋：劫船，回国找公司算账！

崩塌的底线

“劫船”最先由谁提出，已经变成了一个“罗生门”：在11个活着回来的人中，姜晓龙供述是刘贵夺最开始找他说了三次，而刘贵夺则说，是“内蒙古帮”的领头人包德先找他商量了三四次，两人定下来后，才陆续找人串联。对于这个说法，后来死于杀戮、葬身大海的包德，则已经不可能表态。

14名新船员决定，等船加满油后，开始行动。懂得开船的王鹏说“没有船长他也行”，会计算油耗的马玉超则坚持说他不动手。一些老实的船员不想犯险，大多以“没有想好”搪塞了过去。

2011年6月17日白天，“鲁荣渔2682”进行了一次燃油补给，船长李承权对于这个夜晚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丝毫的预感。不到晚上11点，他便已经在船体第三层舵楼的船长室睡下。11点多，刘贵夺等7个人拿着杀鱿鱼的刀和绳子破门而入，将他从床上拽起来。刘贵夺让他起锚回国，李承权本能地拒绝，结果左大腿立刻被这个小他15岁的年轻人捅了一刀。

“刘贵夺说要回国找公司讨个说法，”李承权后来交代说，“不然的话，他就炸船，把船上的人杀了。”

李承权最初拒不合作的态度，招来的是刘贵夺和包德等人用铁棍的殴打。在头部被击打造成短暂晕厥之后，他被拖到舵楼。轮机长温斗用一个船员的头发当线，用针将李血流如注的伤口进行了简单的缝合—在后来诸多份杂乱的描述中，温斗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无人说清。

陷入困境的李承权当时并不知道，第一次杀戮正在舵楼外的舷梯上发生。听见船长室的声响，平日与李承权私交不错的伙食长夏琦勇操刀冲上舷梯要求见船长。负责把守着舷梯的姜晓龙非常紧张，他拿着刀对着这个平时被大家称为“老夏”的中年男子比画着说：“说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儿！”

夏、姜二人扭打起来。姜晓龙捅了夏的后背两刀，刘贵夺从舵楼里冲出来，趁乱向夏的左腿和臀部各捅了一刀，并喊来同乡刘成建，命其将夏的腿打折。夏琦勇抓住其中的一把刀刃，但腿被铁棍击中，最终姜晓龙的刀刺中了他的胸口。

姜晓龙后来的回忆甚至出现了些许模糊：“夏琦勇倒下以后，我用刀扎他，说实话，那时候我就蒙了，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直到黄金波拽我说‘姜哥，别捅了，人还没死呢’，我才有有点清醒过来。”

恍惚之间，姜晓龙还记得当时温斗跟他说“别干傻事儿”，他回答说：“不会的，要不是老夏硬往里冲，（我）也不会弄他。”

目睹夏琦勇倒下后，李承权在逼迫下用卫星导航为渔船设定了回国的航路一经过夏威夷，进入日本海，最后回到中国。航线设定完成后，李承权被刘贵夺等人绑了起来。船上的通讯设备和定位系统也被关闭。

船起锚后，姜晓龙看倒下的夏琦勇像死人一样脸色发白，眼珠一动不动，便和刘成建及一名内蒙古籍船员一起，想将夏抛入大海，或许是因为紧张，他们第一次没有拽住，夏琦勇从舷梯摔倒一层的甲板，三人又下到甲板，将他扔进了海里。

夏的死在船员们的人性底线上悄悄打开了缺口，杀人变成了一件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崔勇回忆，姜晓龙在劫船第二天拉他入伙一起看管管理层时，曾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说：“杀人的事不用你干，老夏就是我杀的。”

刘贵夺试图控制态势，命令将鱿鱼刀和救生衣统一保管。包德嫌黑色塑料柄的鱿鱼刀太软，又与刘贵夺等人拆下了原本为制冷设备支架的白槽钢，用船上的角磨机和砂轮，打磨出了9把更加锐利的尖刀。

姜晓龙等人轮流持尖刀、铁棍走岗，4人一班，“主要是看管二副为首的其他船员”。

船员的住宿位置也被调整，船长和大副被软禁在驾驶室，负责燃油机维护的温斗、温密和大管轮王延龙住宿在机舱的四人间，其余大连籍船员，都换到二层甲板的十二人间住宿。

五天三次杀戮

尽管渔船已经自动行驶在归途，但劫船的船员们对管理层的猜疑始终没有停止。在刘贵夺等人后来的供述中，他认为大连籍的职业船员们暗中试图重新夺回对船的控制权，阻止新船员的回国计划。

在渔船这个不到1/4个足球场大小的封闭空间里，猜疑参杂着恐惧，让船员们人人自危，琢磨着如何避祸保命——如果不能在这艘油漆斑驳的渔船上见缝插针，跨出船舷就是冰冷、无归的海水。高压之下，人与人互相接触、说话太多都能引来猜忌。

在太平洋上行驶了一个月后，“鲁荣渔2682”从南半球的冬季驶入了北半球的夏季，但紧张如冰的气氛并未缓解。五天之内，三次丧心病狂的杀戮再次打破了高压之下的平静。

第一次杀戮，缘于渔船的动力异常。“鲁荣渔2682”上配有大小两种燃油机，为了保证燃油支撑渔船可以顺利回国，刘贵夺一直让轮机长温斗用省油的小燃油机工作，可当船进入夏威夷以西海域后，刘贵夺发觉渔船动力下降、油耗上升。温斗解释称，小燃油机坏了，只能用大燃油机。

这让一直高度紧张的刘贵夺更加警惕。看到平时二副王永波、岳朋、温斗等几个大连籍船员私下“秘密说话”，刘贵夺和包德决定除掉后患。他们开始胁迫冯兴艳等人加入劫船，否则就将其扔进海里。为求自保，冯兴艳等人“归顺”。

7月20日晚，刘贵夺给参与杀戮的船员下的命令简短而冷酷：“留下大管（轮），把大车（轮机长）叫上舵楼后再动手，手脚都麻利点儿！”

“杀人小组”成员黄金波去敲机舱四人间的门，谎称渔船舵角仪出了问题，让温斗去舵楼检修。看温斗走出去后，黄金波、姜晓龙等五人冲进四人间内，黄和两名内蒙籍船员持刀看管住大管轮王延龙，姜晓龙和刘成建直接将还在床铺上的温密乱刀捅死，然后拖出机舱扔进大海。

温斗丝毫没有觉察出即将笼罩他的厄运，当他从舵楼出来走下舷梯时，黄金波、刘成建和姜晓龙三人已经在那里等着对他下手。包德一刀就把温的身体“捅透了”。温斗慌乱中向船边后退，最后被四人顺势推入海中。

事后，姜晓龙说：“杀温密、温斗之前，我们这些人都是喝了点儿酒壮胆，杀温斗之后，我酒劲就过了，有些害怕。”

随后刘贵夺、黄金波、姜晓龙、冯兴艳等人，将船员岳朋、刘刚、姜树涛和二副王永波依次用乱刀刺杀、逼迫跳海

的手段杀害。

这一晚，消失的还有大学生马玉超。他目睹了这场杀戮，吓得哆嗦。刘贵夺看见他的样子还说：“你别害怕，我不杀你。”与马玉超关系较好的段志芳回忆，马是半夜失踪的，第二天起床后“发现铺上已经没人了”。船上的人“找了三圈”未果，干脆也把他放在枕头下的日记，和那几套沾血的被褥一起，丢入大海。

对大连籍船员的清洗在第二天凌晨结束。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三人被依次叫到甲板上，刘贵夺向他们索要银行卡、密码和家庭住址，无论他们给或不给，接下来的命运都是被逼进了大海。至此，在夏琦勇之后，又有10条生命消失在大连海之上。

李承权和大副付义忠天亮之后才发现少了许多人，同乡们的惨死，对原本处于船员层级金字塔塔尖上二人产生了不同的心理冲击。李承权后参与了施暴，而付义忠则试图伺机逃命，最终葬身大海。

从策划对管理层的谋杀起，刘贵夺就已经有了向船员家属勒索钱财的念头，他心中早已经明白“死了这么多人，回国是不行了”。弄一笔钱“偷渡去日本”，成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他头脑里天真的想法。

2011年7月23日，他逼迫剩下的船员们以得阑尾炎、干活受伤需要治疗为由，用卫星电话向家里索要5000元钱，然后打到一个韩姓朋友的银行卡里。有些船员在打电话时语无伦次，心情矛盾，劫船之后一直负责掌舵的丁玉民，就支支吾吾地没有对妹妹讲出那串银行账号。正是这第三次集体打电话，让很多船员的家属感到了蹊跷。但船员邱荣华、单国喜的亲属们并未多问，甚至凑钱汇了款。

沾血的“投名状”

就在刘贵夺为未来焦虑的时候，黄金波为他带来了一条消息，让刘的头脑再次瞬间充血。黄金波说，“内蒙古帮”的包德以老乡的关系拉拢他，对他称刘贵夺只想带着两三个信得过的黑龙江老乡去日本，把剩下的人全部杀掉，所以希望黄金波跟他们一道“反了刘贵夺”。

刘贵夺，这个成为渔船上实际头目的80后年轻人，当即决定除掉“内蒙古帮”以及与他们“走得近”的同伙。他叮嘱姜晓龙、刘成建看紧“内蒙古帮”的行踪，暗中以各种借口收缴了他们的刀具；他半诱导半威胁船长李承权说，自己手上已经有了七八条人命，剩下的人想要活命，就必须“沾点血”。见李仍在犹豫，他又刺激李称，王永波是包德杀的一这或许多少让李承权有了报复的念头，因为王李二人平时私交甚笃，以兄弟相称。这样的情绪加上保命的恐惧，李承权最终同意跟随刘贵夺。

一直没有参与杀人的大连船员崔勇、段志芳，也主动找到姜晓龙，希望姜可以跟刘贵夺说情，让他们入伙。姜晓龙表示自己说了不算。在某一瞬间，姜晓龙也曾对二人流露出了自己的绝望：“跟我们干啥，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我自己活哪天都不知道呢。”

对“内蒙古帮”的杀戮，也成为了对李承权等“新人”的“投名状”。7月24日，刘贵夺把尖刀交给李承权，让姜晓龙等已经“沾过血”的人拿着刀站在二层的甲板上，看着李承权带着王鹏、崔勇等人动手刺杀包德。

李承权等人向包德的腹部、后背捅了数刀，却没有放倒这个蒙古汉子。崔勇见包德被捅伤，赶紧将沾在手上的鲜血胡乱抹在脸上，大声喊到：“我沾血了！我沾血了！”包德挣扎着往外冲，又被等在后面的黄金波捅中一刀，绝望之中选择了跳海。

剩下三个内蒙船员见势不妙，已经顾不得穿上裤子、拖鞋，慌乱中纷纷跳海。被视为与内蒙船员们走得近的邱荣华、单国喜也在乱刀阵中选择了跳海了结生命。

“内蒙古帮”等6人被清算的第二天，刘贵夺再次将刀具收缴由自己保管，“不想再杀人了”。但他希望“安定”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仅仅一夜之后，又一场骚乱不期而至。

7月25日凌晨，李承权起床上厕所，回到驾驶室突然发觉燃油机转速表的转速从980猛降到700左右，他赶紧带人寻找原因，最终发现机舱底部进水。此时，他发现已经找不到大管轮王延龙。

船舱漏水是船底总阀开了，这个只有王延龙和温斗知道，但那时候温斗早已被推入大海。

沉船的恐惧感瞬间笼罩在这些没有航海经验的船员心头，李承权再次显示出了船长的职业本色，他和刘贵夺阻止了想要跳海求生的骚乱船员，将他们有序组织起来，通过关闭主机、抽水、放锚、绑空油桶等方式，将船逐步稳定下来。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中，一直被劫船者控制的大副付义忠，带着官学军、丁玉民、宋国春三个同为大连籍的船员，身着救生衣，跳上载有救生物资的救生筏悄悄逃走，李承权发现后曾大声招呼付义忠等人上船，但遭到拒绝，因为“回来也会被杀死”。

救生筏不仅没能救命，反而惹来杀身之祸—洋流又将四人送回到“鲁荣渔2682”号旁边，这一次，或许是认为遭到了背叛，愤怒的李承权没有再喊他们上船，而是说：往死里打。后来在法庭上，李承权辩称，付义忠当时试图割断渔船的锚绳，他是为了船的安全。

就这样，刘贵夺、李承权、姜晓龙、刘成建等人朝木筏上投掷钓鱼用的两公斤重的铁坠，付义忠、官学军、宋国春见状弃筏跳海，姜晓龙跳上木筏持鱼枪捅刺丁玉民，丁玉民也只好跳海。

求救的宋国春被拉上渔船，已经开了杀戒的李承权怂恿刘贵夺，让“手上没沾血”的项立山和段志芳杀掉宋国春。项、段二人听到命令时，立刻愣在了原地，随即，担心被灭口的他们，不顾宋国春的苦苦哀求，剥下了他的救生衣，用绳子捆了他的手脚后，又在绳子上系上了五六个铁坠，黄金波也在一边“帮忙”，又往宋的衣服口袋里塞上了两个铁坠。

宋国春就这样被推下甲板，成为了最后一个遇害者。这条船上的生命消失了2/3，活下来的11个人成为了“全员恶人”。

陆地上的诱因

失踪的王延龙制造的机舱进水，让“鲁荣渔2682”彻底失去了动力。为了活命，李承权打开了关闭一个多月的通讯设备，发出求救信号—此时，虽然渔船已经进入了日本海域，但刘贵夺偷渡日本的美梦，也与渔船上的杀戮同时画上了句号。

与“鲁荣渔2682”失去联系后，鑫发水产所在的荣成市两套领导班子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一个月前，他们请求过智利海军协助，将“鲁荣渔2682”的捕捞区域拉网搜查，却一无所获。7月25日，收到“鲁荣渔2682”求救信息后，在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协助下，中国派去的渔政118号船将“鲁荣渔2682”拖回了它的出发地石岛港。

2011年8月12日9时，这艘神秘的渔船终于在荣成石岛靠岸。但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这艘出发时载有33人的渔船，下船的只有11人。尽管刘贵夺和李承权曾组织过“幸存”的船员们串供，将罪行推到死去的包德等人头上，同时销毁救生衣、刀具等各种证据，把包括航海日志在内的“有字儿的东西”全部扔进了海里，但警方在船上发现的大量喷溅型血迹和人体组织，还是让他们的谎言不攻自破。

随着案情逐渐清晰，无论是凶手的家属还是被害人的家属，都有一种不真实感。大连当地派出所里，当警察递给船员王鹏的母亲一张荣成警方的拘留通知书时，她如同遭遇雷击。她说，看到“涉嫌故意杀人”几个字时，她想叫，但嗓子是哑的，她想按指印，但哆哆嗦嗦怎么都按不下去。最后，三个警察抓住她的手，把手印给撤了上去。

崔勇的母亲看到拘留通知书时，当场就跟警察打了起来。她深信老实的儿子不可能杀人，甚至央求邻居几十人，联名给崔勇写了一封长长的证明—后来，崔勇对她说，他在船上—度想跳海寻求解脱，但想到年迈的父母和贫寒的家境，他选择了“沾血”，回国坐牢。

成为被告的11个船员里，接近半数都请不起辩护律师，只能接受指定的法律援助。而不少的被害人家庭，也只能一起聘请一位律师进行诉讼。

“法庭上，11个被告从外貌上看，都是让人难以留下深刻印象的普通人。”来自大连的张文谱律师说，“他们自己也都供述，当船员的动机就是觉得赚钱多。”

船员们在口供中反复提及的“沾血”一词或许是个微妙注脚—他们也许始终不想面对“杀人”的事实。在法庭上，法官曾问刘贵夺“沾血”是什么意思，他先是拒绝解释，后来顿了一下，说：就是杀人的意思。

2013年7月19日这一纸判决并未让船员家属们服气，有些人当庭选择了上诉。他们不服判决的理由有两个：一是18个新船员在没有拿到船员证的情况下就被送上了渔船，二是鑫发水产当时与船员们签订合同时，确实存在问题，而这正是这次惨案的诱因。

根据国家海事部门的规定，只有经过基本安全、救生、消防和急救的培训（四个月培训时间并需要考试通过）拿到“四小证”后，人员方可登船，而远洋船舶的船员，必须要向海事局申请相当于护照性质的海员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被告辩护律师称，“鲁荣渔2682”上的人间惨案，渔船所属企业应该负相当的责任。远洋船舶的船员心理负荷通常很大，工作生活环境逼仄，以及不容打破的船员等级管理制度，轻则让没有经验的新手人体生物节奏混乱，重则会引发心理学上的“路西法效应”，出现暴力行为。没有出海经验的船员超过了船员总数的一半，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集体骚乱和杀戮埋下了心理上的隐患。在对11名被告的审讯过程中，船员项立山还被查出了有盗窃罪的前科一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鑫发水产在招聘船员过程中的不够规范。

根据为温氏兄弟代理劳务费和工伤赔偿的张文谱律师反映，“鲁荣渔2682”属于“荣成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但警方最后从温斗的遗物中找到的合同，上面盖的章却是“荣成鑫发渔业有限公司”。他到工商部门去查，发现该公司在工商部门从未注册过。

因为马玉超被认定“失踪”，按照司法程序，冯桂杰和老伴要在判决3个月后，再向警方申请认定死亡。这个瘦小、黝黑的女人至今一提起儿子，眼泪还是哗哗往下掉，打湿那件与她年纪极不搭称的绿色T恤，“两年里我们从大连到威海，来来回回六趟，路费已经出不起了。我现在回老家没有了房子，回大连没有了儿子，还有三个老人要养，孩子的奶奶到现在都不知道孩子已经没了，一过节就问孙子怎么不回家。”

冯桂杰曾想去“鲁荣渔2682”上看看，给儿子烧些纸钱，但未被允许。这艘沾满鲜血的渔船，早已重新装修后于去年出海，开始了第六次远洋作业。

“施工进度会受天气影响，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6月1日开园应该没有问题。”

纳入机构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当前文章: <http://www.socialbookmarkingadd.com/article/46199.pdf>

发布时间: 2018-02-20 00:09:41

[日落大道](#) [夜市人生](#) [nana](#) [cba总决赛](#) [刀塔传奇](#) [游戏米果](#) [兰博基尼爱马仕](#) [启辰](#)
[2017中学生励志演讲稿](#) [最新最火的励志电视剧](#)